

英階層內部複雜的政治生態的揭示顯示出其敏銳的歷史洞察力，但這只是部分地解釋了共和政治的時代困境。若能就保守派如何同樣藉助演說和新興媒介來回擊共和主義話語加以着墨分析，或許能夠豐富關於傳統與現代之關係的固有觀念，亦能使本書的闡述內容更為充實。

謝魏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韓孝榮，《紅神：韋拔群與華南邊疆的農民革命》，香港：中華書局，2023年，379頁。

韋拔群與毛澤東、彭湃並稱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三大農運領袖，其領導的右江農民革命受到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韓孝榮新著《紅神：韋拔群與華南邊疆的農民革命》，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將韋拔群領導的邊疆農民革命，置於更為宏大的時代背景中加以考察，旨在通過分析韋拔群在邊疆社會與國家政治的互動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更加深入地探討其領導的革命運動。全書圍繞韋拔群的兩次外出遊歷和三次組織暴動來編排章節，正文共分8章。

第一章介紹廣西東蘭縣的社會生態以及韋拔群的少年時代。東蘭是韋拔群的出生地，亦是其開展革命的核心地區。清末民初的東蘭完全符合中國人眼中的「邊疆」形象。首先，東蘭是多民族聚居地區，人口最多的是土人，也叫壯人，地位亦最高，漢人和瑤人是當地的少數民族，漢人地位高於瑤人，瑤人處於社會最底層。其次，東蘭的經濟、文化尤為落後，交通不便阻礙了商貿發展，土司長期統治導致本地形成了「重武輕文」的傳統。1894年2月6日，韋拔群出生於東蘭縣東裏村的一個富裕家庭，他既有紈袴子弟的大膽任性，也有慈善家的慷慨善良、儒家君子的愛國之心，更有農民的樸實、知識份子的精明、騎士般的豪情、壯人的勇敢，最重要的是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擅於策劃和組織，渴望領導民眾。

第二章講述1914至1921年間韋拔群的首次遊歷。1914年，韋拔群決定進行一次遠行，他去到上海、廣州等大城市，並得以大開眼界。1915年底，韋拔群回到東蘭，不久後又加入討袁運動之中。此後，他因反對部隊連長體罰士兵而入獄，所幸在同鄉盧濤將軍的幫助下得以釋放，還得以進入貴州講武

堂受訓，並於1919年畢業。1920年10月，韋拔群再次前往廣州，結識了廖仲愷、馬君武等傑出精英，並加入中國國民黨和「改造廣西同志會」，這些人脈關係對其政治生涯產生巨大影響。總之，韋拔群的第一次外出遊歷不僅得以增長見聞、拓寬視野，同時收穫了大量政治資源，並贏得了東蘭青年的尊崇。

第三章講述1921至1924年間韋拔群領導的第一次暴動。1921年底，韋拔群回到家鄉東蘭，並向朋友們分享自己接觸的新思想，使他們認識到東蘭需要一場社會革命。1921年10月，韋拔群及其朋友攜手創立政治組織「改造東蘭同志會」，標誌着東蘭革命的開端。此後，韋拔群等人經常到集鎮演講，積極爭取民眾的支持。1922年初，韋拔群帶領東蘭民眾與軍閥劉日福、地主杜八進行抗爭，並取得勝利，有力證明他善於團結民眾及運用輿論與地方權貴鬥爭。1922年，韋拔群將「改造東蘭同志會」改名為「東蘭公民會」，從依靠少數革命精英轉變為動員廣大農民。從1923年開始，東蘭革命進入暴力階段，韋拔群先後4次率領農軍攻打東蘭縣城，並於第四次攻下。然而，縣城雖被攻陷，但卻難以維持控制，在百色軍閥的鎮壓下，第一次暴動以失敗告終。

第四章講述1924至1925年間韋拔群的二次遊歷。第一次暴動的失敗令韋拔群意識到外部支持對於農運成功的重要性，因此他決定再次走出廣西，建立新的人脈。1924年10月，韋拔群和陳伯民抵達廣州，並在廖仲愷的建議下加入第三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習。此次廣州之行，韋拔群經歷了世界觀的轉變和政治覺悟的飛越，得以更深刻地了解共產主義思想，結識了更多共產黨員，並將其視為盟友，共產黨人也把他看作親密戰友，這為雙方後來的合作埋下伏筆。1925年3月，二人從農講所提前結業，返回廣西。

第五章講述1925至1929年間韋拔群領導的第二次暴動。1925年7月，新桂系擊敗其他軍閥統一廣西，此時，韋拔群等人也返回家鄉，準備重新開展革命。回到東蘭後，韋拔群帶領革命同志到各地動員農民，並於1925年9月將「東蘭公民會」改造為「東蘭縣農民協會」，不僅使其組織更完善、規模更龐大，關鍵是得到了廣州政府的支持，更具合法性。同時，為了培養農運領袖，韋拔群採用在廣州學到的方法，創辦東蘭農民運動講習所。值得注意的是，東蘭農講所和農民協會在成立後，開始扮演政府的角色，履行調解糾紛、維持治安、徵收商業稅等職能。隨着農運不斷發展，農民協會與豪紳軍閥開始爆發武裝衝突，1926年2月，農軍戰敗，撤入山區，軍閥豪紳則在東蘭鄉村燒殺搶掠，史稱「東蘭慘案」。1926年5月，韋拔群開始尋求外界的幫

助，國民黨左派陳協五和共產黨員陳勉恕先後來到東蘭，農運得到大力支持，並取得最終勝利，而韋拔群與共產黨的關係也由此越發密切。1927年，「四一二」政變爆發後，新桂系開始在廣西扼殺農運，韋拔群再次率部撤入山區，而國民黨的猛烈進攻也促使韋拔群決定加入中國共產黨。

第六章講述1929至1930年間韋拔群領導的第三次暴動，自此地方革命開始融入全國革命。1929年初，俞作柏和李明瑞推翻新桂系，組成新的廣西省政府，並決定與中共合作，中共亦把鄧小平、張雲逸等共產黨人派往廣西，使南寧成為共產黨的新基地。1929年底，俞李政權反蔣失敗，中共決定將部隊開往桂西北重鎮百色，以此更加靠近韋拔群的根據地東蘭。南寧和東蘭兩地革命者的結合，造就了廣大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而韋拔群的個人政治生命因此徹底匯入更為宏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百色起義後，右江地區開始實施土地革命，東蘭在韋拔群的影響下最早踐行了各項政策，對於贏得民眾的擁護大有助益。革命者在東蘭地區創建了兵工廠、現代化醫院、軍事訓練班，一定程度推動了邊疆的現代化。

第七章從生態和文化因素分析1930至1932年間革命走向失敗的原因。1930年10月，紅七軍主力北上江西，年底，中共失去了右江沿岸的大部分鄉鎮，根據地僅剩東蘭、鳳山及其周邊地區，而新桂系已經恢復了對廣西的統治，並準備對中共進行「圍剿」。韋拔群通過整合右江各縣的赤衛隊組建紅二十一師，擔任領導者大多是其忠實支持者。新桂系在1931年初發動了對紅軍的首次「圍剿」，但並未對革命運動造成實質性的破壞。1931年11月，新桂系對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圍剿」，給紅軍造成了軍事上的挫折，同時，敵軍在「圍剿」結束後繼續包圍根據地，使紅軍難以獲得糧食和物資，從生態或經濟上說，革命已難以持續。除生態因素外，文化因素也制約了革命的發展。東蘭革命融合了外來革命文化和本土造反文化，二者均偏好暴力手段，而暴力衝突形成惡性循環，使民眾開始對革命感到失望。1932年8月，新桂系的第三次「圍剿」開始後，生存成為紅軍最迫切的問題，革命的全面崩潰已不可避免，最終韋拔群也被叛徒韋昂所殺害。

第八章討論韋拔群犧牲後的形象塑造問題。革命時期，右江地區即廣泛流傳着韋拔群變龍、變虎的傳說，韋拔群犧牲後，一些農民認為他並沒有死，而是已經成神，並在東里村建立了一座紅神廟，將其塑造為一尊紅神。韋拔群在世時，是一個存在爭議的黨員，原因是其發動的革命帶有綠林好漢的色彩，在他犧牲後，黨內同志不再談論其缺點，相反齊心協力地把他描繪成一位完美的黨員。韋拔群生前也從未擔任過右江地區的中共頭號領導人，

但犧牲後卻被塑造成當地最負盛名的共產黨人。民國時期，東蘭壯人認為自己既是壯人又是漢人，許多壯人甚至刻意隱藏自己的少數民族身分，主動接受漢人身分，新中國成立後的民族平等政策使得壯族認同得以復興，韋拔群也在去世20多年後被正式認定為一位壯族人以及最傑出的壯族革命家。

相較於以往關於韋拔群及右江革命的研究，本書最大的亮點在於研究視角上的創新，能夠將韋拔群及其領導的邊疆農民革命與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的變遷結合考察，揭示出中國中心地區的新文化和新思想如何傳入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以及革命如何把一個邊遠落後地區變成一個政治中心，並對國家政治發生重要影響。同時，作者的諸多獨到見解，也有助於加深學界對右江革命的理解。例如，作者認為「東蘭地方衝突的結果，往往取決於外來武裝的在或不在」（頁113）。又如，作者指出韋拔群是一座「連接邊緣與中心、邊疆地區與國家的橋梁」，在強化邊疆社會與共產主義體系的聯繫上發揮了協調統一的作用（頁318）。此外，關於韋拔群犧牲之後的形象塑造問題，此前學者關注較少，而作者則對這一問題作出了深入的論述。總之，無論是作為韋拔群的個人傳記或是右江革命的專題探討，本書都具有重要貢獻。

另外，本書也提示我們，將右江革命置於邊疆社會歷史發展脈絡中進行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族群生態和文化傳統對革命的影響。那麼，當我們將研究視野延申至更長的時段，也許會得出更深的認識。例如，作者已注意到瑤人處於地方社會的最底層，如果溯其根源，其實是清代大量移民遷入之後，區域生存空間有限，瑤民被迫進入山區，並長期被土司、山主等勢力所掌控，因此具有較強的革命性。又如，作者已注意到韋拔群在東蘭一帶具有強烈的神話色彩，呈現亦「紅」亦「神」的特點，其實類似現象在右江歷史上也十分常見，晚清以來許多起義者即是通過建構信仰的方式開展民眾動員。

同時，當我們拉長研究時段，或許還可以得出一些不同的結論。例如，作者認為羅文鑒、龔壽儀等軍閥武裝，在東鳳革命中屬於外部力量，正是他們的介入，使得韋拔群領導的農運多次受挫。但深究之後我們會發現，這些力量並不能完全看作外部力量。羅文鑒是鳳山羅氏土目的後裔，其家族在本地有着極其強大的勢力，儘管他已投身軍閥，但主要活動範圍依然在東蘭、鳳山一帶，本質上是藉助軍閥的力量穩固其家族在當地的統治地位。龔壽儀雖然歸附於桂系軍閥，但其本質是清末民初社會動亂的時代背景下興起的地方武裝勢力，其維繫軍需則主要依靠右江一帶的豪紳為其徵收稅糧，二者之

間存在緊密的合作關係，形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因此也很難將其完全看作外部勢力。筆者認為，韋拔群所領導的農民革命之所以多次受挫，主要還是受到邊疆既有權力格局的制約。

秦浩翔

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

井黑忍，《黃土地帶の環境史：灌溉の技術と水利の秩序》，東京：研文出版，2024年，314頁。

井黑忍在《分水和支配——金、蒙古時代華北的水利和農業》一書中，通過運用包括碑文在內的大量歷史資料，從多個角度探討了12至14世紀水源長期匱乏、外族入侵與統治背景下，華北地區推行的農業政策、水資源的分配方式以及社會如何得以維持。在此基礎之上，著者將視野擴大，轉向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位於亞歐非大陸乾燥地帶東端的黃土高原。通過研究此地區的灌溉技術和水利秩序，探討克服水資源不穩定性的機制及其演變過程。

本書由3部、8章構成。第一部「水與社會相關的諸問題」由第一章「水利社會史總論」構成。本章黃土高原梳理了近年來水利社會史研究成果，分析研究的特徵與趨勢，並提出自己的論點。首先，作者指出，華北地區關於水與社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到民國時期，研究主題涵蓋環境、制度與日常生活等。其中，泉水利用的研究相對全面，因此作者提出，應以泉水利用地域的個案研究為基礎，進一步開展多地域的比較研究，以此探究各地域的社會特性。其次，作者強調延展研究時間軸的必要性。對於明清之前，學界多以群體意識的形成過程為切入點，探討水利與宗族之間的關係，從而考察山西地域社會的特徵。而對於明清之後，雖然部分學者已經論及明清至20世紀中葉，但若將研究時段延伸至20世紀後半葉，並將其與當代環境問題聯繫起來進行考察，則可以使華北地區水與社會的研究更加豐富且完整。

第二部「灌溉的技術」由第二章「呂梁山麓的清濁灌溉」、第三章「關中平原的井戶灌溉」以及第四章「大同盆地的淤泥灌溉」構成。第二章作者聚焦三峪地區，考察當地的傳統水利方式。由於當地保存了豐富的水利碑、